

寿春县申县“春申”源出新解

——楚考烈王记事④

沈国冰



武王墩墓出土的漆木器

本报记者 张 越 摄

国,如姜姓申国。

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时,得到了曾国(后来的随国)的响应和支持,因有功于东周,随国(曾国)成为“汉阳诸姬”之首,申国则被视为“汉阳诸姜”的代表。

周王室设立“汉阳诸姬”,一开始是为了防御“淮夷诸寇”。周穆王击溃淮夷后,“汉阳诸姬”的任务转为守卫青铜运输线。后来,南方的楚国开始崛起,“汉阳诸姬”的任务又变为防备楚国。

随(曾)国作为“汉阳诸姬”的核心强国,多次成为楚国扩张的目标。

楚武王三次伐随,看起来似乎每次都有摆在明面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实则未必如此。周王朝和包括随国在内的“汉阳诸姬”心里都明白,楚武王攻打随国的真实意图,首要目标是控制铜绿山战略资源铜矿,其次是打通东进北上的通道。

随着楚国的崛起和周王室的衰微,楚国历代君王励精图治,一以贯之的不懈进取和努力,“汉阳诸姬”要么被楚国击败,要么成为楚国的附庸,要么被楚国吞并纳入版图。

“汉阳诸姬,楚实尽之”。降服了“汉阳诸姬”,楚国不仅控制了汉江流域战略资源铜矿,同时打通了东进和北图中原的战略通道。

楚国的崛起和争霸中原的宏图,很快就要实现了。

3

商武丁征伐南方时,封后裔于权,建立子姓权国,镇守南疆(今湖北荆门境内)。

西周取代商朝后,因权国地处偏远且具有战略价值,周武王对权国进行安抚,权国于是归顺周朝,得以保留封地和爵位,仍为权国,正式成为周朝诸侯,并奉周王之命镇守南疆。

权国成为“汉阳诸姬”重要成员之一。因为权国处于楚国之南且紧邻楚国,楚国崛起后,权国成为楚国向南扩张的绊脚石。

楚灭权之心,数任楚君磨刀霍霍。别看权国面积不大,实力却不小。

权、楚之间,进行了长达一百余年的缠斗。公元前767年,楚国终于击败权国。

彼时,东周是第二任周君周桓王姬林。周桓王个人能力很差,导致周王室衰微,诸侯示强,根本不遵王意。

早在公元前704年,熊通开诸侯僭越之先河,自立为楚武王,一时让天下诸侯侧目。平庸的周桓王竟然毫无办法,只能听任之,默认之。

周桓王的无能,无疑更助长了楚武王熊通的嚣张。

楚武王熊通似乎认定周桓王软弱可欺,于是一举吞灭了权国,把权国故地纳入楚国

版图。

在楚国攻灭权国的过程中,楚国贵族斗缗立下大功。斗缗满心期待着楚武王一定会把权国分封给他,让他实现当上国君的梦想。

然而,斗缗的期待只实现了一半。

楚武王的确没有亏欠立下灭权大功的斗缗,真的把权国故地给了斗缗。

但是,斗缗却不是权君,而是“权尹”。

楚武王熊通设置的不是权国,而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政权设置模式:权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权县,诞生了。

4

县,悬也。

“县”字始见于西周金文,古字形似“悬首于木”,本意为“悬挂”,引申为“维系”“远置”之意。

县制,意为“地方政权直系中央”。还保留有“挂”的原意。县,远悬在外,但悬于国君的手中。

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武王熊通,郡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嬴任好。据此,中国的县制创设要早于郡制的创设。它们共同构成了郡县制的雏形。

郡县制最终成型于秦汉,隋改郡为州,州县制取代郡县制。

郡县制是分封制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地方政权行政制度。

郡县制是中央垂直管理地方,地方官员由国君(王)、皇帝直接任免的流官任期制。郡县制的出现,标志着血脉政治被官僚政治取代,同时也是中国贵族封建制度走向封建制度的标志。

鲜为人知的是,春秋时期,县比郡的建制高。也就是县大于郡,县下设郡。进入战国之后,慢慢演变为郡大于县,郡下设县。满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县,设县长。

县以下设乡、里、亭。两亭之间相隔十里,设亭长,亭为治安组织兼顾公文传递事宜。

汉高祖刘邦,曾经就是泗水郡下辖沛县的泗水亭长。

所以,不要嫌弃亭长职务低下,只要不懈努力,只要抓住每一个机遇,貌似可以像刘邦那样,最终成为高祖皇帝。

郡设郡守、郡尉、都监(监御史)。郡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受中央节制。郡尉,负责全郡军事。都监,负责监察。

秦统一六国后,出现了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分封制和以廷尉李斯为代表的郡县制之间的激烈争论。

秦始皇嬴政最终选择了郡县制。于是,秦朝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从秦朝开始,郡的建制大于县,郡下设县,也就是郡辖县。

秦始皇嬴政之所以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就是因为嬴政看到了分封制的弊端。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有自己的军队,官吏由诸侯任免,税收全部归封国所有,君王对诸侯的话语权和节制权大大削弱。有异心和野心的诸侯国,还经常和王室分庭抗礼,诸侯造反也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而郡县制,可以根本扭转分封制的所有弊端。郡的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命,县的长官由郡守任命且报皇帝批准。郡、县长官,不可世袭。这样的话,郡、县长官直接听命和效命皇帝,会对皇帝更加忠心耿耿。同时,郡县没有自己的军队,税收除了留存大部分上缴。

这是嬴政极力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的根本动因。

然而在嬴政时期,围绕分封制、郡县制的争论从未消停过。“焚书”和“坑儒”的导火索,就是分封制、郡县制的争论而引发。

嬴政以为,郡县制可以保证国家的永固。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当陈胜、吴广大泽起义,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很快席卷全国,居然没有一个郡守、县令誓死效命皇帝。也许秦二世心里在想,要是亲戚诸侯该多好!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汲取了秦朝覆灭的教训,实行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模式。这样的话,当有人造反的时候,就会有诸侯国挺身而出,不至于重蹈秦朝“没有亲戚救场”的覆辙。

事实证明,刘邦是英明的。因而当淮南国王英布造反时,很快就被平定了。

5

中国,为东周的建立立下不世之功,因而成为“汉阳诸姜”之首。

中国,为西周初年受封的姜姓诸侯国。初封之时,位于西周的西边,为西周镇守西部边疆,史称西申国。

周宣王时期,赶走了谢国(封地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改封申国于谢国故地,史称南申国。

公元前678年,楚文王灭中国(南中国)后,设置莘县。莘和申通假,莘县即申县。

中国(南中国)被灭后,申人东迁至今河南省信阳市,后来在楚平王时期复国,史称东申国。

申国,成为申姓的起源。这就是历史上申国的变迁。申县,被保留于楚国的版图内。

6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元年。楚考烈王以黄歇为相,赐准北地十二县作为黄歇的封地,封号春申君。

春申君的“春申”,究竟是何意?源出于何处?学界对此一直争论不止,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统一的定论。

学界所持的大多数观点,都是从“春申”字面蕴意来解读“春申”的含义和源出。

黄歇的封地“准北地十二县”,究竟是哪十二个县,因为史料的缺失,至今也无定论。但是,寿春县和申县,毫无疑问是在“准北地十二县”之列。

众所周知,寿春县由下蔡县改名而来,曾经的蔡国都城,声名显赫不减当年。申县由中国而来,曾经的中国,声名显赫亦不逊当年。

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作出这样的推断:

彼时,当楚考烈王赐号黄歇时,选取了“准北地十二县”中,最有影响力的“寿春县”和“申县”的“春”和“申”,以此作为黄歇的封号。

“春申君”据此得名。这或为“春申”的蕴意和源出。

回汉一家亲的典范

赵 阳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九季)大型征文

位于寿县古城西南清真寺巷内的寿县清真寺,全称“华东清真大寺”,是“国内较为少见的巨大华丽的伊斯兰教建筑”(《中国伊斯兰教建筑》)。

其建筑风格属于清代徽派建筑,局部保留了明代建筑特点,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年代最久、保存最好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清真寺,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其重要的是,寿县清真寺还是沿淮地区民族团结的见证,回汉一家亲的典范。

据现代版《寿县志》记载,北宋中期,古城寿县就有回民迁入,代代相传。城内紫顺街西曾有“回回街”和小清真寺,人口约200户、千余人。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在古城西南新建清真寺,并在清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续建前殿,道光年间(1821—1850年)、光绪年间(1875—1908年)重修,形成今日之规模。

寿县清真寺是中国传统的中轴对称的合院式建筑,占地面积5632平方米,坐西向东,布局疏朗。寺内建筑灰砖绿瓦,主要采用传统徽派建筑形式。大门、二门、南北厢房均为硬山顶、砖瓦粉脊。主体建筑无像宝殿面阔5间,进深7间,殿前是开阔的庭院,正中为石砖铺砌的路面;大殿的四周有回廊,廊柱全部用八公山上的整块石料打制而成。大殿由前、后两殿组成,结顶采用“勾连搭式”衔接,飞檐角,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整座大殿建筑既为一个整体,同时又富于变化。大殿屋顶铺铜板瓦,亮花筒正脊的中心置一个葫芦,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常见做法。大殿左右各开券门5楹,水磨青砖门罩。券眉雕刻,构图巧丽,技法精湛,具有浓厚的徽派砖雕艺术风格。

寿县清真寺的建筑形制,有三个特别之处:一是门向方位。当地汉民建筑中轴线多是自南而北、门向朝南;而寿县清真寺建筑中轴线是自东而西、门向朝东。据说,这主要是因为麦加在西方,门向朝东,人们自东入门,面向西方,是表示对真主朝拜的虔诚之心。二是大殿顶部采用的“勾连搭”结顶方式。这既增强了屋顶结构多变的艺术效果,更主要的是增大了建筑使用面积。明清时期,建筑形制由礼部明确规定,一般王公大臣最大建筑开间也只能5到7间,只有皇官大殿才可享受9到11开间的建筑。而寿县清真寺面阔5间,由此推断,当时寿县清真寺规格已经很高。目前虽无确切史料证明寿县清真寺是最早采用“勾连搭”结顶方式的建筑,但在江淮之间仅此一座,显得弥足珍贵。三是大殿内柱石础高度比其它同类建筑柱础高出数十厘米。在中国古建筑设计中,木柱下方常常垫放石础用于防潮防腐。关于柱础加高,当地流传着一段佳话:寿县清真寺建寺之初,大木作开料完毕准备拼装,当地有人发现大殿设计高度超过南侧毗邻的关帝庙大殿,提出异议。穆斯林林事召集族人议事,认为回民迁了寿州城,与汉民亲如一家,穆斯林应遵循五典,相互体谅,决定把大殿立柱锯掉部分,使大寺与关帝庙高度持平。当地汉民得知后深受感动,考虑到汉民敬奉关圣帝君,正是因为关帝仁义勇智、重情厚礼,而穆斯林兄弟与汉民血脉相连,不应于扰施工,便提出将关帝庙殿顶脊加高的解决方案。回民兄弟知晓后十分感动,决定恢复清真寺大殿原设计高度,但因江淮一带一时难以筹办合适的高大木材,最终通过增加石础高度来弥补锯木材的长度,成就了一段“包容天地大、回汉一家亲”的佳话。

雕刻精美、形式多样的建筑装饰艺术,也是寿县清真寺一大特色。大寺内外所有的角柱和廊柱,都是凹式梅花柱,殿内木柱的柱础呈鼓形,刻有石雕的莲瓣纹、蔓草纹;大门中央的门环、两侧精雕的石鼓,以及门框上的多角形门簪等,简洁、大气而美观;大殿两侧券门上的水磨青砖门罩,券眉的四方球形雕饰和卷草纹样,都十分精美。千姿百态的窗格花纹也成为寿县清真寺一种重要的装饰。

清真寺内外悬挂有20多块匾额、楹联,多为历代州府赐予,尤以大殿上方悬挂的“真乃独一”“无像宝殿”和“福祿寿”等三块匾最为珍贵。这些牌匾,既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宗教建筑的神韵,同时也阐释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体现了清真寺社会认同的历史真实感,为大寺增色不少。

清真寺院内道路边的两排银杏,树围均在5米左右,树龄最长的已达600余年。这些银杏皆是清真寺在不同时期举行相关纪念活动时所植,这也是中国公共建筑记事的传统做法。多年来,寿县清真寺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和保护,多次拨款进行维修加固。目前,作为当地伊斯兰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淮河水位持平,此井水甘甜可口,又名圣井。古镇南端旧时有“望淮楼”,廊柱上手书一副楹联:“望淮楼,望淮流,望淮楼上望淮流,淮楼千古,淮流千古;映月井,映月影,映月井下映月影,月井万年,月影万年”。寿春乡村,古井众多。窑口马湖村的桃花井,每到三月,桃红粉红,村姑成群,井旁一石上有深深足印,传说为仙女所留。大顺顾家大庄的九眼井,与门边的八眼水井,血脉相连,一井汲水八眼齐动,井水甘冽且长年不竭。南乡茶庵有两口井,传说朱元璋体察民情,派御史柏大夫到茶庵巡视旱灾,打了两口深井,解决了饮水问题。寿地有句谚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百姓感恩把井命名为东大夫井、西大夫井,两井壁生长青苔藓,四季青而鲜嫩,可入药治病,井水烧开无苦味,初茶香甜。刘集镇炎东村有一古井,传说张果老骑驴经过,驴渴饮水井,走时见一村姑在井旁劳作,随即赐名四姑井,一年大旱,炎刘境内塘坎井、庙庄井都已干涸,唯此井水依旧,周围十里八里来四姑井拉水,得以息患。寿春乡村的诸多古井,如三觉镇顾岗村的响井、小甸镇邵店村的鹅毛井、隐贤古镇的董子家井等等,每一口井,都蕴含着故事和传说。

寿春依水而生,利水而兴、近水而美,水书写出了几千年的史话。俯瞰寿春,大笔一挥的“竖弯钩”,成了润泽寿春大地西部的淮河;流经古城北的淝水如一巨大的“走之旁”;笔一点化作瓦埠湖;而春秋战国时期,孙叔敖又在寿春西南部用大笔蘸取颍水点下一个巨点,成就天下第一塘——安丰塘,宛如恢宏的感叹号,为世人所震撼。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六季)征文

管子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水,是生命之源,寿春是一片历史悠久,具有古老文明的地域,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对水资源有深刻的认识和广泛的应用。古寿春在夏代分天下为九州时就已成为要地,春秋时是江淮一带政治、文化和军事重镇。到战国时代,蔡国多位君主在此建都四十七年,楚国在此建都十九年;汉代淮南国以寿春为都七十四年;公元197年(建安二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早在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寿春地区就有了水井。寿春人虽依水而居,但只能在河湖附近居住,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农业生产与生活取水成了一个大问题。自从发明了打井,人们就可以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居住,开阔了活动范围,也改善了人类的饮食卫生条件。《淮南子·本经训》说:“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益是虞舜时人,曾协助大禹治水。古籍记载凿井技术是伯益发明的,而实际上古代水井的出现,比这要早得多。

寿春城是楚晚期都城,通过对遗址的系统考古发掘,人们不断了解寿春的水文化内涵,也不同程度地发现一些古井的痕迹。楚寿春在今寿县西南四十里之丰庄铺之北,故于《统一统志》和李兆洛《凤台县志》。据楚都寿春城遗址调查小组简报记录,位于丰庄的涧洼遗址,

包括冯家圩子、李家台子等地,地面有大量的筒瓦、板瓦、陶井圈。20世纪50年代,丰庄涧洼大队抗旱在淮河夹河开沟引水,挖到陶井多处。从涧洼崩塌土中发现的爵和觚等文物,结合其他考古证据,可以推断这些陶井在商和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在寿春大地上,它们一方面用于农田灌溉,一方面用于生活。商代,随着青铜工具广泛使用,凿井技术进一步提高,由初期井内壁多是上天下小略呈圆锥体的深土坑发展为上下相等的筒形。石块砌井最早见于西周,寿春遗留下来的一些水井,还可以看到这种类型,井壁从上至下加砌一圈石块,石块都经过挑选或初步加工,大小大致整齐。战国时期,铁制工具普遍应用,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凿井技术提高,开凿水井更加普遍。由于制陶业发达,为了防止土井塌陷,污染井水,出现了陶井。涧洼遗址的陶井属于这种类型,井身用一节一节的陶井圈套叠起来,最多的有十六节。打井时,事先挖一口土井,当挖至接近水线的流沙层时,将陶井圈放入井内,再从井圈内挖去泥土,井圈逐渐下沉,上边再套井圈,一直挖到一定深度的水位为止。这是打井技术的一个创新。西汉以后,由于砖的出现,陶井又逐渐被砖井取代。井筒砖砌技术很进步,有子母埽弧形砖券、六角形、平砌式等多种形式。